

I 516.4/3

西线无战事

雷马克著

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〔德〕雷马克

西线无战事

朱 雯 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Erich Maria Remarque
Im Westen nichts Neues

根据Im Propyläen-Verlag/Berlin, 1929年版, 并参照 A. W. Wheen 的英译本 (G.P. Putnam's Sons, London, 1929 年版) 和 Ю. Н. Афонькина 的俄译本 (Лениздат, Ленинград, 1959年版) 译出

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, 暂定二百种。通过这些作品, 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、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。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, 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。

西线无战事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67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\frac{1}{2}$ 插页 5

1983年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48,000

书号 10208·121 定价 0.78 元

这本书既不是一种控诉，也不是一份自白。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，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，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。

我们待在火线后面九公里的地方。昨天我们才换了防；这会儿肚子里都装满了菜豆煮牛肉，大家感到又饱又满意。每个人甚至还有一满饭盒的东西可以留到晚上吃；另外，香肠和面包也发了双份。这就满不错了。象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：那个脑瓜象西红柿一般的炊事员只顾劝我们吃；他用长柄勺子招呼每一个走过的人，舀给他结结实实一大勺菜肴。他简直毫无办法，不知道该怎么把他的炖锅及时地清出来。恰登和米勒端着两个脸盆，把它们盛得满满的，作为储备。就恰登来说，这是出于贪食成性，而就米勒来说，这是出于谨慎小心。至于恰登的东西到底吃到哪里去了，那倒是一个谜。他现在是，而且今后还会是瘦得如同一条鲱鱼。

更加了不起的是烟也发了双份。每个人十支雪茄，二十支纸烟，还有两块嚼烟；在眼下，这已经很可观了。我拿嚼烟去换卡特辛斯基的纸烟，这样我就一共有四十支纸烟。一天抽抽是足够的了。

说真的，我们其实没有权利得到这么些意外的收获。普鲁士人并不是那么慷慨大方的。多亏计算错误，我们才捞到了这么多东西。

十四天以前，我们不得不开到前线去调防。我们那一带战事相当平静，因此特在后方的军需官为我们保存了规定数量的生活资料，供全连一百五十人回来时应用。不料正好在最后那

一天，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和加农炮向我们袭击，对准我们的阵地不停地猛轰，因此我们受到的损失十分惨重，生还的只有八十几个人。

昨天晚上我们撤离前线，马上安顿下来，首先想好好地睡一大觉；因为卡特辛斯基的话说得很对：只要大家能够多睡一点，这个战争也不算太坏。在前线，我们几乎不曾睡过什么觉，一连熬了十四天，时间是够长的了。

我们第一批人还没爬出营棚，已经是正午了。半小时后，每个人都拿好自己的饭盒，跑到随军伙房前排队，有股油腻和滋养丰富的香味从那边飘过来。排在长队最前头的自然是那些最饿的人：小阿尔伯特·克罗普，我们中间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，所以只当了个一等兵；米勒第五，他随身还带着学校里的课本，梦想着考试，在密集炮火轰击的时候还刻苦地背诵着物理学的定理；勒尔，他蓄着络腮胡子，特别喜爱军官妓院里的窑姐儿；他一口咬定，按照军队里的命令，这些窑姐儿都得穿上绸衬衫，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的客人时，事先还得洗个澡；第四个便是我本人，保罗·博伊默尔。我们四个人都是十九岁，四个人都是从同一个班级里出来，参加战争当志愿兵的。

紧跟在我们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：恰登，一个瘦骨嶙峋的钳工，年纪跟我们相仿，在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。坐下来吃的时候，他身材瘦细，可他吃罢了站立起来，却又粗大得如同一只怀孕的臭虫；海伊·韦斯特胡斯，也跟大家同年，是个挖泥煤的，他能够轻轻松松把一个配给面包抓在手里，问人家：猜猜看我拳头里抓的是什么东西；德特林，一个庄稼汉，他除了田园和妻子，什么也不想；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·卡特辛斯基，咱们这一伙人的首领，坚强，机灵，狡猾，年纪四十，有

着一张土灰色的脸，一双蓝幽幽的眼睛，一副罗锅的肩膀，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，它嗅得出浑浊的空气、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工作。

在炊事房前面，我们这一伙人站在长队的最前列。我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因为那炊事员毫无所知，一直没来理会我们。

后来，卡特辛斯基喊他了：“赶快把你的舀汤勺子拿出来吧，海因里希！大家都看到菜豆已经煮熟了。”

他睡眼惺忪地摇了摇头：“你们先得个个都到齐了才行。”

恰登呲牙咧嘴地笑了笑：“我们个个都在这儿了。”

那炊事班军士依然不理睬。“在你们看来可能都到齐了！可是还有一些人到底又在哪儿呢？”

“他们今天是不会来吃你的东西了！他们不是在野战医院，就是在群葬墓地长眠啦。”

炊事员知道了这个情况，茫然不知所措。他动摇了。“可我已经煮了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啦。”

克罗普往他腰里搔了一下。“那么这一回咱们倒可以饱餐一顿了。来，开饭吧！”

恰登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。他那尖尖的、耗子似的脸蛋焕发起来，一双眼睛狡猾地眯缝着，面颊在搐动，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小声说道：“你这个人啊，那么面包你也领来了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了，是吗？”

那炊事班军士愣头愣脑、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。

恰登一把拉住他的上衣。“还有香肠呢？”

那西红柿脑瓜又点了点头。

恰登的颞骨在颤动。“纸烟也是一样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样样都一样。”

恰登容光焕发了。“哎呀，这才叫做走运咧！全是给咱们准备的！每个人都能得到——让我算一算——一点不错，正好是双份！”

西红柿这才重新醒悟过来，说道：“那可不行。”

这会儿我们都很兴奋，开始围拢过去。

“那为什么不行，你这个胡萝卜头？”卡特辛斯基质问道。

“本来是给一百五十个人的东西，不能让八十个人给拿走。”

“我们回头给你颜色看，”米勒喃喃地抱怨着。

“饭菜我可一点不在乎，但是我只能分发八十个人的份，”西红柿坚持着说。

卡特辛斯基生气了。“这一次你应当宽宏大量点，是不是？你领的不是八十个人的军粮，你领的是第二连的，这就够啦。那你发给我们吧！我们正是第二连嘛。”

我们动手推撞那个家伙。对这个人谁都没有好感，有过好多次，由于他的过错，饭菜送到我们战壕里往往太晚，而且都凉了，因为在炮火底下，他不肯把锅子移得近些，所以我们那些送菜的人不得不比别的连队多跑好一程路。现在，第一连的布尔克倒是个比较好的小伙子。他虽然胖得象只冬天的土拨鼠，可是临到紧急关头，他甚至会把手一直抬到最前面的火线上来。

我们正好都怀着这种无可非议的情绪，若不是我们的连长到来，肯定会发生一场骚乱。他问清了争吵的原因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是的，我们昨天损失惨重。”

随后，他朝那锅子睃了一眼。“这些菜豆看样子还不坏。”西红柿点点头。“是用大油跟肉一起煮的。”

那少尉瞅着我们。他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。而且他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，因为他到连队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军士，后来从我们行伍中间升上来的。他又把大铁锅的盖子揭开，嗅了一下。于是他一边往前走，一边说道：“给我送一满盘来。把所有的饭菜都分发掉。我们是用得着的。”

西红柿的脸上露出一副惘然的神情。恰登在他周围手舞足蹈起来了。

“这又一点也不破费你什么！倒象军需处储藏的东西全属于他私人似的。现在你就动手分吧，你这个爱吃肥肉的家伙，可你千万别数错了。”

“你这个该上绞架的！”西红柿怒吼着。他已经垮掉了；每逢事情弄得他没法理解的时候，他就干脆认输。好象为了要表示一切都对他无所谓，他还主动地给每个人多发了半磅人造蜜。

* * *

今天真是了不起。甚至邮件也送来了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两三件信和报纸。我们溜达到营棚后面的草地上。克罗普的胳膊底下挟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。

草地右边，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公共厕所，盖着屋顶，结构也很坚固。不过这是给新入伍的士兵们用的，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尽量利用随便哪一件偶尔碰上的东西。我们却需要更好的处所。到处散放着一只只矮小的、单独的箱子，就是为了那个用途。这些箱子是方形的，很干净，四边都用木板围着，座位舒适得无懈可击。边上还有把手，可以随意搬动。

我们搬来了三只，围成一个圆圈，大家舒舒服服地坐下了。这一坐就坐了两个小时，我们才站起来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初我们在营房里当新兵，非得用公共厕所不可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感到不好意思。厕所没有门，二十个人并排坐着，仿佛在火车车厢里一般。这样，一眼就可以把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；原来当小兵的必须时刻有人监视。

这期间，我们学会了对这类小节不再觉得害臊。到后来，比这还要糟得多的事情我们也不以为意了。

这儿虽然是在露天，上厕所却全然是一种享受。我再也无法理解，我们从前对这类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觉得害臊，其实，它们还不是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。它们若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那么重要的作用，而在我们的心目中偏偏又显得那么新奇，我们也许不会对它们特别注意；对其余的人来说，它们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。

胃和肠这些器官对士兵说来比对别的人可要亲密得多。他的词汇，四分之三都是从这个处所得来的，不仅在表达最大的喜悦，而且在表达最深的愤怒方面，在这儿都能找到一种强烈的韵味。要表达得这样贴切，这样清楚，用任何别的方式都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回到家里去，家里人 and 老师们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，可是在此地，这却是一种通用的语言。

强制地公开出来，已经使这些个事情在我们心目中恢复了它们那纯洁的性质。更何况，它们本来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，舒舒服服地解决一下，正象玩纸牌时候拿到一手稳赢的同花顺次一样地得到乐趣。胡诌出“茅坑传闻”这个词儿，倒不是毫无道理的；这些场所原是部队里的流言制造所和公共休息室咧。

我们觉得此时此刻比在任何铺着白磁砖的豪华厕所都好。在那儿，只能说是卫生；可在这里，却是美妙。

眼下真是出奇地无忧无虑的时刻。我们头顶上是一片蓝天。天边悬挂着浅黄色的、给阳光照亮的侦察气球，以及高射炮弹散发出来的一团团白茫茫的烟雾。有时候跟踪追击一架飞机，那么这些烟雾就象稻束一样升上去。

我们隐约听到前线那沉闷的隆隆声，真象十分遥远的雷鸣。野蜂嗡嗡地飞过，就把这种声音压下去了。

在我们周围，伸展着一片繁花盛放的草地。青草摇摆着细嫩的散穗花序，白蝴蝶翩翩翻飞，飘浮在残夏那柔和的暖风上面。我们读着信，看着报，一边还抽着烟。我们摘下了军帽，把它们放在身边。和风拨弄着我们的头发，它也拨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。

三口箱子就放在那光闪闪、红艳艳的野罌粟花中间。

我们把那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。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很好的玩纸牌的桌子。克罗普身边带着一副纸牌。每打完一回三个人玩的牌局，就插进一次两个人玩的牌戏。人们可以永远这样坐下去。

一只手风琴的乐声从营棚那边飘过来。我们不时地搁下纸牌，向四周张望。一个人会说：“孩子们，孩子们……”或者说：“那一回可真是九死一生咧……”于是我们便沉默了半晌。我们的心里，都有一种强烈的、压抑的感觉，大家都意识到，不需要用多少言语来表达。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：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坐在这几口箱子上面了；眼下，已经十分接近这个时候啦。因此，样样东西都是新鲜的，强烈的——殷红的罌粟，可口的食物，纸烟，还有夏天的风。

克罗普问：“最近有谁看见过克默里希？”

“他在圣约瑟夫医院里，”我说。

米勒认为他的大腿上穿过一颗子弹，倒是一张可以回老家去的挺好的护照咧。

我们决定当天下午去探望他。

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。“坎托列克要我向你们大家问好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米勒把纸烟扔了，说道：“但愿他也在这里。”

* * *

坎托列克原来是我们班里的教师，一个严厉的、矮小的人，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，长得活象一只尖嘴的老鼠。他的身材，跟“克洛斯特堡的恐怖”希默尔施托斯军士差不多。说也奇怪，天下的不幸往往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；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，他们更加精力旺盛，更加不容易相处。我一向十分留神，决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；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残暴的家伙。

在体操课上，坎托列克向我们作了长篇报告，直到我们全班的人，在他的带领之下，一起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。他怎么样从眼镜后面瞪着我们，用令人感动的嗓音说道：“你不愿意参军吗，同志？”这一切我觉得仍然历历在目。

这些教师往往把他们的感情藏在背心口袋里备用，只按课时掏出来向人家炫耀炫耀。可是在那时，这一点我们却并没有想到。

我们中间，确实有一个人迟迟疑疑，不愿意入伍。那个人就是约瑟夫·贝姆，一个胖胖的、和气的小伙子。可是他毕竟还是被说服了，否则他会失去体面的。而且象他那样想的，在我们中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，不过没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坚持

下去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连自己的父母也随时会使用“懦弱”这个词儿。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都毫无所知。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贫穷和纯朴的人；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，而那些处境较好的人，虽然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本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，却反而快乐得忘乎所以了。

卡特辛斯基断言，这都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。卡特说的这些话，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。

说也奇怪，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。在一次冲锋的时候他的眼睛受了伤，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，以为他死了。我们没法儿将他带回来，因为自己也得匆匆忙忙地赶回来不可。那天下午，我们忽然听到他在呼唤，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我们这边爬过来。原来他仅仅是昏了过去。因为他双目失明，而且又疼得发疯，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，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进来，他就外面被打死了。

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列克；如果要每个人都承担罪责，那还成个什么世界呢。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，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，用的也是无损于自己的方法。

而这也正是我们亲眼看着他们垮台的原因。

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，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，走向工作、职责、文化和进步的世界，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指导者。我们常常嘲笑他们，稍稍作弄他们一下，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却是信任他们的。他们所代表的权威的观念，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、更合乎人性的知识联系在一起。可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第一个死者，却把这种信念完全给破除了。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些；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我们。那第一次密集炮

火就向我们揭示出了我们的错误，而他们所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崩溃了。

他们仍在继续写文章，发表演说，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；他们依旧在说为国家服务是头等大事，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恐惧比以前更为强烈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却决不做叛乱者，决不做逃兵，也决不做胆小鬼，——这些个词儿，他们原是随便使用的——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，我们英勇地参加每一次进攻；可是我们也有所辨别，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问题。于是我们看到，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荡然无存。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可怕；而我们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。

* * *

在动身去看克默里希之前，我们先拾掇好了他的东西；这些东西，他在回来的路上都要用的。

野战医院里活动非常繁忙；里头始终弥漫着一股炭酸、乙醚和汗水的味儿。这种气味，我们在营棚里大多是闻惯了的，可是到这儿一闻，却还是感到很不舒服。我们打听克默里希；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，看到我们时露出一种虚弱的表情，显得又喜悦又茫然。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，有人把他的一块表给偷走了。

米勒摇了摇头：“我总是跟你说，谁也不该带这样好的一块表来的。”

米勒这个人有点粗卤，也不太圆滑。要不，他就不会吭声了，因为个个人都看得出来，克默里希是再也不会走出这个病房了。他能不能把表找回来，已经完全没有有什么关系，至多也不过把这块表寄给他的家属罢了。

“情况怎么样，弗兰茨？”克罗普问。

克默里希把脑袋沉了下去。“还不坏，只是我的脚可他妈的疼得太厉害。”

我们看看他的被子。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，被子成拱形盖在那上面。我往米勒的胫骨上踢了一下，因为他差一点就要把外面那些护理员告诉我们的话讲给克默里希听：克默里希的脚已经没有了。他的腿已经被截去了。

他的气色很可怕，又萎黄，又苍白，脸上还有一条条异样的纹路，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因为到如今已经看见过几百次了。那其实不是纹路，而是标志。在皮肤底下，生命已经不再跳动；它被挤到身体的边缘那儿去了，而死神正在从里面起着作用，而且早已把一双眼睛给控制住了。这儿躺着我们的伙伴克默里希，前不久还跟我们在一起烤马肉，蜷缩在弹坑里；这仍然是他，然而又已经不再是他了，他的形象变得模模糊糊，仿佛一张照相底片拍了两次似的。甚至连他的嗓子也变得如同火灰一般沙哑无声了。

我想起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。他母亲，一个善良的、胖乎乎的女人，陪他到了车站上。她不断地流着眼泪，把个脸蛋儿都哭得又胀又肿。克默里希为此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她最不能沉着镇定，简直瘫做一团，成个泪人了。后来她看见了我，一再拉住我的手臂，恳求我到了那边以后照顾弗兰茨。他确实有着一张孩儿似的脸，而且骨头也是那么软弱，只背了四个星期的背包，一双脚已经成为平足了。可是在战场上，一个人怎么能照顾别人啊！

“现在你马上可以回家了，”克罗普说，“轮到休假，你至少还得等上三四个月才行咧。”

克默里希点点头。我不忍看他的手，那双手简直象蜡。指甲里面还有战壕里的泥土，颜色蓝里透黑，如同毒药一般。我忽然转到一个念头，这些指甲在克默里希停止呼吸以后很久，还会继续生长，仿佛瘦细的、精灵鬼怪似的地窖里的植物。我看到展现在眼前的一幅图画：它们象开瓶塞的螺丝钻那样卷起来，一个劲儿往上长着长着，而同时往上长着的还有那崩解了的脑壳上的头发，象是沃土里的青草，的确象是青草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米勒低下身去。“我们把你的东西给带来了，弗兰茨。”

克默里希做了个手势。“把它们搁在床底下。”

米勒照他的话做了。克默里希又提起那块表来了。我们怎么能叫他放心，而又不引起他疑心呢！

米勒直起腰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双飞行员的长统靴。这是一双漂亮的英国皮鞋，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的，高到膝盖，从下往上都有带子系缚着，是件叫人艳羡的东西。米勒一看就很高兴，便把靴底跟他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鞋比了一比，问道：“那你也要把这双皮靴一起带回去吗，弗兰茨？”

我们三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：即使他恢复了健康，也只能穿一只皮靴，因此这一双鞋对他总是没有用处的了。可是，照眼下的情况看来，把它们留在这里却很可惜，——等他一死，护理员自然马上就会将它们拿走的。

米勒重新拿起来：“你是不是愿意把这双靴子留在这儿？”

克默里希表示不愿意。这是他最好的一件东西。

“那我们不妨拿东西来交换，”米勒又建议道，“在前线这儿，人们倒是用得着它的。”可是克默里希却没有被说动。

我往米勒的脚上踩了一下，他才勉强把这双漂亮皮靴放回

床底下去。

我们又谈了一会儿，随后就告辞了。“好好保养，弗兰茨。”

我答应他明天早晨再来。米勒也这样说；他是在想着那双用带子系缚的皮靴，所以要亲自在场。

克默里希呻吟着。他在发烧。我们到外面去抓住一个护理员，要他给克默里希打一针。

他拒绝了。“要是我们把吗啡开给每一个人，那我们得有满满的一桶才行呢……”

“你们只有军官才肯好好地侍候，”克罗普恶狠狠地说。

我急忙去打圆场，递给那个护理员一支纸烟。他接过去了。我便问道：“那么你们一般地也可以给人打针吗？”

他着恼了。“如果你认为不是这样的话，那你何必还要问我呢？——”

我又把几支纸烟塞到他手里。“请你给我们帮个忙吧——”

“哦，也好，”他说。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，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人，想要自己去看看。我们就在外面等着。

米勒又把话题转到长统皮靴上来了。“那双靴子，给我穿起来可合适得真是没有话说咧。穿着自己这双笨重的皮鞋，我总是要起疱，一个接着一个的。你认为他会拖到明天早晨值勤以后吗？要是他夜里就去了，那我们眼看着那双长统靴——”

阿尔贝特回来了。“你们以为——？”他问。

“完了，”米勒推论道。

我们朝着营棚走回去。我想起明天一定要给克默里希的母亲写的那封信。我浑身都凉了，巴不得喝下一点烧酒。米勒拔起几根草，塞在嘴里嚼着。蓦然间，矮小的克罗普把纸烟往地上一扔，用脚狂暴地乱踩，还向四周观看，抬起一张毁损了